

勞動現場的反身寫實與 在地範疇的存在感

楊弘任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I

這一次，謝國雄真的走到反身性科學的極致境地來了。

選定「商品拜物教」為考察主軸，謝國雄由典型工業城市高雄港都的傳統行業皮鞋匠、鐵路搬運工、計程車行業、派報行業、電影辯士入手，對比於公營唐榮鐵工廠和民營美麗島塑膠化工廠，試圖為台灣式資本主義與台灣式勞動體制再作一次全面而深入的刻畫與診斷。作者延續以往著作中「紮根式（立基式）個案方法」與「擴展式（延伸式）個案方法」的特色，在細緻的參與觀察或深入訪談之後，一方面以紮根式個案方法歸納出勞動現場中最具在地特色的次級概念，另一方面仍不忘以擴展式個案方法的理論引導，指向台灣社會的資本主義與勞動體制特質，突顯了台灣勞動者志願性順服之所以形成的歷史與制度發生過程，以及台灣勞動者自我商品化的商品拜物教特殊在地機制等等面向。

關於資本主義與剩餘價值在廣義或狹義定義上的爭論，以及如何強化勞動現象中的性別向度與再現方式等等，都是本書足以引發讀者深刻思索與論辯的要點，這也是作者特別強調以台灣社會為「在地普遍化」之個案，同時卻能將「西方個案化」的重要著力點。不過，我將提議讀者以不同視角來閱讀本書，亦即，從作者念茲在茲的「結構與行動」社會學基本課題，以及「在地範疇與在地普遍化」創新而重要的課題出發，嘗試為本書作一定位與評介。《港都百工圖》除了具體行業別深入而細膩的分析之外，在全書第一章、第七章與結尾的

第八章，都有關於社會本體論與社會學書寫再現等面向上的重要突破。我將由第一章、第七章與第八章入手，嘗試標定並回應作者關於「結構與行動」、「在地範疇」、「存在感」等課題，並評介作者勇於揭示的「西方個案化、在地普遍化」現階段成果與未來展望。

II

把第七章、第八章當作首章來閱讀，這樣倒著讀謝國雄的《港都百工圖》，別有一番趣味。

在全書即將落幕的第七章，〈寂靜之聲：「合理化」的底層〉，作者帶著我們進入一種接近魔幻寫實的小段落中，如果沒那麼魔幻寫實的話，就用作者自己的命名來定位，既不是寫實也不是虛構的書寫方式，「超實」書寫，這樣更傳神。

長期自我期許必須紮根立基在「最在地的在地細節」中，無論1997年的《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或2003年的《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謝國雄都讓我們不得不隨著最在地的田野細節與在地範疇，如「做件意識」、「本分觀」、「命」等等在地化的次級概念，轉折到探討資本主義與勞動體制時無法迴避的「剩餘價值萃取與遮掩」與「志願性順服」等等最普遍的普遍結構來，同時將立基紮根法與擴展延伸法熔於一爐。然而，這兩部相當重要的著作中，也讓人稍有遺憾，尤其對於不是身在工業社會學或勞動社會學領域的準局外人而言，更是如此；最終而言，關於資本主義與勞動體制的各種結構性意涵，還是過早主導了整體圖像的描繪與分析。換句話說，這些重要分析仍需一些引人入勝的社會學書寫來鋪陳，以免整體圖像的理解很快被稀釋在主導性結構觀所催促出來的在地範疇歸納裡。一棵樹的肌理枝節與榮枯興衰，太早被整座林子裡的生存競爭與物換星移搶走了注意力。

2013年這一部《港都百工圖》相當不一樣。謝國雄放大了膽識也放鬆了筆觸，在第七章嘗試讓PVC塑膠布開始說話了，「辦、辦、辦……」不停歇的廠房聲響中，最佳報導人塑膠布說話說到社會學家甘

願屈居一旁，最後在夕陽餘暉中，社會學家與勞動現場的粗獷大哥們，以及決定將世界交給社會學家去苦惱的塑膠布，一起捲入仍舊「辦、辦、辦……」但從頭不曾具體存在的生產機台中。好個社會學者，敢將這麼嚴肅或嚴酷的「勞動現場的核心現象」這麼活靈活現地進料、調製、組裝、裁切、疊合、甚至自創起品牌來了。當PVC塑膠布代言了個別受訪者之後，突然展演了一種勞動生命的豐富完整性，一種綿密的存在感，台灣式資本主義與台灣式勞動體制，這下子暫時無須太多立基紮根或延伸擴展來撐腰；自我解嘲好像是來研究「一個很抽象的問題，我聽不太懂：什麼剩菜剩飯的，喔，是剩餘價值，什麼蓋來蓋去的，取這取那的……用我的話來說，他大概要問：工人知道公司的錢是工人替它賺的嗎？」（頁 341），但又不時抽身全景俯瞰細細解釋「生產大順車」（頁 344）、「績效獎金合理化」（頁 346-354）的PVC塑膠布，此時既不是社會學家自身、也不是現場代表性的勞動者、更不是體制合理化的代言人，此時的PVC塑膠布很「台客」、很在地，不時東撿一句、西兜一段，偷偷地在讓準局外人變成「勞動議題關心者」、「資本主義的潛在批判者」。當使命重重的社會學聲音浮現，「但是在台灣，很少人會說自己的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PVC塑膠布與半虛構的現場大哥則說了，「只要你有我互相，我管你什麼社會？是不是？」（頁 354-355）。好個PVC塑膠布啊，好個社會學者。

結構性的課題，「台灣的資本主義與勞動體制怎麼運作於無形」，經過作者所說多層次實在的「結構展現樣態」與「行動中介樣態」，就這樣傳神地跟在地範疇的「互相」觀點，交融為一體。

III

「多層次的實在」研究分析之主張，衍生自 Michael Burawoy 長期倡議並示範實作的延伸式或擴展式個案方法(extended case method)。Burawoy 以勞動研究、全球化民族誌為例，說明延伸擴展式個案方法是一種「反身性科學」(reflexive science)，這樣的科學現象觀不同於實

證科學所要求的必須降低四種脈絡效應：如何降低調查對象的反應干擾性(reactivity)、如何控制調查情境的不確定性而能確保不同調查者進行調查的可信度(reliability)、如何使調查事件具有重複驗證性(replicability)，以及如何確保調查事件的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等問題。Burawoy 認為延伸擴展式個案方法剛好從四個脈絡效應的困局中，找到新的認識論立足點，他指出延伸擴展方法採取截然不同的科學現象觀點，亦即以「反身性科學」對比於「實證性科學」，從反身性出發。第一，觀察者延伸為參與者，客觀的觀察者與現場的行動者互為主體，參與觀察者甚至介入事件的衝突或共識形成過程，而研究對象的回應即具重要社會意義；第二，將參與觀察延伸為對時空情境的敏感度，以社會史的背景呈現事物運作的社會過程，剛好說明不同的研究者就會有不同的互動情境，而不同的互動情境本身也仍是社會分析的要點；第三，進一步再將參與觀察延伸為結構化歷程，看到外力與個案或結構與行動的交互作用；第四，將參與觀察的個案考察成果，延伸為對既有普遍理論的挑戰，藉由個案作為該理論之異例，修補並彰顯普遍的社會運作機制。藉由這樣的翻轉，Burawoy 以反身性科學來定位延伸擴展式個案方法的優勢；簡言之，反身性科學確保了科學的客觀性，但無須被實證科學的歸納式狹義實在觀所限制（楊弘任 2007: 11；Burawoy 1998: 10-13）。

從實證性的科學走到反身性的科學，延伸擴展式個案方法看到的「個案」都是獨具在地特性的「異例」；同時，唯一的客觀實在，也變成了「多層次的實在」，隨著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互為主體性的過程，隨著不同行動者關懷之所在、行動之所在、互動之所在，事件開始變化而有多層次的展現樣態，研究者關切的重要研究現象，也因為自身的參與觀察而「看到」、甚至「做出」不同層次的實在。在《港都百工圖》各章中，尤其在第七章的一整節接近魔幻寫實的社會學書寫中，讀者具體看到這樣「反身性科學」的精采成果。作者說這是一種「超實」的再現方式，既不是實證寫實也不是小說虛構。以 Paul Willis 的說法，也就是一種接近於架出一座橋在橋上看著滾滾流逝的

實在之流，這樣的研究視野即是平行於實證、藉由實證資料作出概念的誘發、在超越實證歸納時又與實證資料時時呼應的一種進路。換句話說，實證不再是直接提取概念的原料庫房，實證像是刺激研究者更深入在地現象，並嘗試更大膽構想所處社會特質的催化劑（楊弘任 2009: 368；Willis 2000）。

因為延伸擴展式個案方法的反身性科學認識論導引，謝國雄從早期《純勞動》的研究起，以至後來的《茶鄉社會誌》，雖然援引立基紮根式個案方法為「在地現象」的最佳研究起點，但卻未止步於此。立基紮根有助於研究者深入研究現象的在地細節，甚至隨著被研究者逐步進入指引細節實作的基本分類範疇——在地範疇。《港都百工圖》走得更遠，除了追隨被研究者進入勞動現場、勞動生命史之外，作者直探勞動者實作時的重要分類範疇，鮮明呈現了「順法鬥爭」、「順理鬥爭」、「順勢鬥爭」、「命底與生剋」等等（詳見索引與各章）。勞動現場的這些粗獷大哥們，很在地、很台客、很具體展現了「台灣勞動者」的生存情境與生命樣態。這裡是台灣，這裡是港都，這裡的經驗不是純然不可比較，但是跨國現象比較之前，就像這樣，謝國雄先突顯了「在地範疇」下豐富在地特色的勞動場域實作樣貌。

PVC 塑膠布為什麼會說話？作者在第七章一開頭正文與兩個註腳中，把互為主體性的研究者自身放進來說明了。研究者的參與觀察、深度訪談、甚至介入實作後，被研究者仍是身處廣泛的勞動體制中，縱使是關廠中、遷廠中的塑膠化工廠，勞動者仍懼怕一種超出勞動現場的規訓力量，勞動者怕萬一資訊權力與治理權力在握的資方提起法律訴訟時，自己受訪說出的這一切，無形枷鎖可能如影隨形。勞動現場的嚴酷情境與認真敏銳的社會學家再次交鋒，迫使社會學家退了一步，於是，PVC 塑膠布化身為高度體制化美麗島塑膠化工廠勞動現場的最佳報導人，沒料到結果竟是海闊天空，讓社會學家跨向互為主體性與多層次實體觀的「反身社會學」一大步。

IV

《港都百工圖》嘗試把我們、把西方移植過來的重要學術領域「社會學」的未來努力方向，向前推進一小步。作者嘗試由港都的百工圖像入手，在做出台灣社會「在地個案」的描繪與分析之後，進一步試著將「西方個案化」、也將「在地普遍化」。

作者既然不是依循狹義實證科學觀來歸納台灣社會的資本主義與勞動體制特質，我們何妨跟著作者，改以反身科學觀、多層次實在觀、由異例轉為範例的在地範疇觀，仔細品味並評介作者這樣的努力已經達成哪一階段的成果，以及仍須哪些修補或突破。換個方式說，讀者可以暫時擱置逐一檢視這些行業別是否窮盡、互斥，或者資本主義、剩餘價值的定義是否明確等等，改以考察這些行業別是否足以彰顯一種「啓迪式的代表性或顯著性」來入手，亦即，當如此刻畫各行業勞動場域時，關於台灣式的資本主義與勞動體制是否讓人逐漸能感同身受起來了。以這樣的反身性科學標準來檢視，《港都百工圖》的代表性或顯著性並非不足，相反的，也許只有類似這樣的反身性書寫，才讓這個社會的「社會質感」、「勞動質感」慢慢剔透出來。

因為是反身性、啓迪式的社會學書寫，作者最後選擇和「結構與行動」這一社會學核心課題作對話，嘗試藉由台灣社會港都個案的資本主義與勞動體制研究，挑戰源於西方社會的社會觀與人觀，進一步，作者不再停留在「異例式」(anomaly)的挑戰與修補，反而更加大膽地提出類似於「範例式」(paradigmatic event)的非西方本體論、認識論、基本議題與研究技法（謝國雄 2007；Geertz 1973）。作者無疑是堅持甚至帶點固執的，就是要念茲在茲，一方面投身於最在地的在地細節裡，另方面抽身到最普遍的普遍結構來。從《港都百工圖》第七章來到結論的第八章，再回到第一章的論證之中，細膩充分的實證田野素材，逐漸鋪陳出一種另類本體論上的說服力。一定程度上，讀者的確願意跟著想一想，也許西方現代性啓蒙以來的社會觀，以結構為實體的社會觀，的確可以再次斟酌與權衡。

《港都百工圖》第八章之中，作者由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行動

中介的呈現樣態，嘗試雙向化解「結構與行動」的二元對立。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大膽引入「結構，非結構，是名結構；行動，非行動，是名行動」的因緣生滅觀（頁 442），並在該章諸多註腳中反覆提起「太極的邏輯與生剋共構」、「無常與緣起」等等另類社會本體論與人觀。這些本體論、認識論、基本議題，並不是神來一筆靈光浮現，同樣的，作者以各章中嚴謹的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以「順法鬥爭、順理鬥爭、順勢鬥爭」或「命底」、「生剋」等來自勞動現場的具體論述，反覆鋪陳並說服讀者，台灣社會中的勞動者或治理者，他們也是如此共享這些深層的在地範疇。在這些在地範疇與存在感的實作脈絡中，台灣社會的的確確是一個獨特的個案，不只是為了挑戰或修補西方社會觀與人觀而來，而是指向「在地普遍化」了，這樣經由在地細節爬梳出來的在地範疇與存在感，本身就是帶有普遍化理論潛力的新方向。

V

《港都百工圖》的作者，藉助結構與行動的重新思考、在地範疇的重新強調，以及行動者存在感的重新確立，嘗試開展一條新的路線，想把西方移植而來的社會學這一重要學科注入源頭活水，讓社會學在地化走向一種在地普遍化的氣度與格局。

作者跟隨 Sewell 檢視了 Giddens 與 Bourdieu 一九七零年代後期起，關於結構與行動的爭論與突破(Sewell 1992; Bourdieu 1977; Giddens 1984)。綜觀 Sewell 全文企圖，一開始與 Giddens 對結構的著名定義對話，重新定位結構作為「規則」與「資源」的意涵和矛盾處之後，Sewell 適度取法人類學取向，不再把規則等同於結構而與作為行動的文化對立起來，他的界定是「規則就在文化之中」。至於資源則是探討「權力」的重要基礎，藉由社會行動過程中資源配置方式的分析，權力的向度也就自始不離社會學考察的原初課題。隨後，與 Bourdieu 對結構和習性的定義對話後，Sewell 也明確挑戰 Bourdieu 所主張結構變遷只能來自外力的不適當預設，直指結構內部亦有其變遷動力。

Sewell 於是帶來「動態結構」的觀點與「結構多樣性」的觀點。結構變遷為什麼可能呢？第一是結構本身的多重性，諸結構不必然會因異形同構的習性驅動，而成爲一致的同質結構。第二是行動者圖式基模的可重組性，行動者經常在情境中權變，而非直接受既定習性所驅動。第三是牽涉到資源所帶來的權力，既然資源累積過程有其不可預測性，則結構也非一次一次簡單的再生產自身。第四是資源的意義多重性，在某處某人不是資源，到另一處另一人則成資源，那麼結構本身就不是硬梆梆的一塊固定實體。第五是諸結構可能彼此交會或撞擊，不同立場的行動者可能在同樣的規則圖式與潛在資源中，借用或挪用規則和資源以壯大自身行動力量(Sewell 1992: 16-19)。進一步，Sewell 藉由對結構的「作用深度」與「權力大小」，區辨出多樣性的結構。簡單說來，「語言」是作用深度很高但權力很小的結構，「國家」是作用深度很低但權力很大的結構，「資本主義」則在巨大權力施展下仍兼具了對社會生活廣泛而深度的作用。再換句話說，行動者對「國家」所展現的規則形態或資源配置，不時發出質疑、要求改變，但又受制於權力直接而明顯的施展方式。行動者對「語言」所展現的規則形態與資源配置，則因影響資源配置不明確也不嚴重，不會時時警覺要求結構改變。但最奇特的則是「資本主義」，明明帶有嚴酷的權力施展，但又廣泛而深度的讓人習以爲常(Sewell 1992: 23-25)。

對比起來，《港都百工圖》的作者謝國雄，雖然讚賞並取法 Sewell 的動態結構觀與多樣結構觀，但最終卻走了一條像是太過發散性、又像是太過同質化的道路。一定程度而言，Sewell 經由挑戰並修補 Giddens 與 Bourdieu 之後，指出了更聚合、更簡潔的結構觀，亦即指引讀者以動態看待結構內部的變遷動力，並時時區辨該結構的作用深度與權力大小，是哪種結構就實實在在定位該結構的規則圖式與資源配置作用力，不同形態的結構方式也就有不同形態的行動空間。但謝國雄在逐次區辨結構展現樣態、行動中介樣態之後，似乎仍想追問：種種志願性順服的總體驅動機制何在？就是這麼一問，過度硬化並同質化了皮鞋師傅、派報工、計程車司機、電影辯士、鐵路搬運

工、唐榮鐵工廠勞工，以及美麗島塑膠工廠勞工所面對的台灣式資本主義與勞動體制，謝國雄又像是走不出處處結構的森林迷宮了。

一個有趣的弔詭是，說謝國雄對結構觀仍是太想找出異形同構之處而過於聚焦也對，說謝國雄反而提供了無處不在過於發散的各種結構樣態也對；無論如何，這本書所呈現的社會學世界裡，「結構」仍像是時時箝制行動者的無形力量，以致於謝國雄必須再次跳入新的二元觀之中，以「養家」、「工作感」等等現象，重新樹立成對比於結構力量的「存在感」，一種解放而自由的力量。

如果把 Sewell 的構想徹底走下來，那麼是不是反而清爽而簡潔？在結構動態觀與結構多樣觀引領下，是不是更能走到以台灣社會的資本主義與勞動體制之個案，提出「在地普遍化」的普遍理論之創新？是不是在「結構，非結構，是名結構；行動，非行動，是名行動」之後，也能輕輕鬆鬆說下去「存在，非存在，是名存在」，以嚴謹的在地細節與在地範疇為基礎，貫徹出一種更徹底的另類本體論、認識論、基本議題與研究技法呢？

無論在勞動個案的刻畫上或社會學核心課題的省思上，作者的貢獻無疑仍是重要而具突破性的。期待《港都百工圖》之後，作者與我們看到的社會學道路越來越寬闊、越來越灑脫。

參考文獻

- 楊弘任(2007)個案能說什麼？——重探詮釋個案法與延伸個案法。見周平、楊弘任編，質性研究方法的衆聲喧嘩，頁 1-18。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 (2009)地方知識與在地範疇：本土化的一種進路。見鄒川雄、蘇峰山編，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頁 367-380。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
-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 (2003)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編(2007)以身為度、如是我做：田野工作的教與學。台北：群學。

——(2013)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rawoy, Michael (1998) The Extended Case Method. *Sociological Theory* 16(1) : 4-33.

Geertz, Clifford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Basic Books.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ewell, William H. Jr. (1992)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1): 1-29.

Willis, Paul (200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Malden, MA: Polity Press.